

唐诗论文集

刘开扬 著



中華書局

5627

806
7275

唐詩論文集

刘开揚著

中華書局

唐詩論文集

刘开揚 著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号)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7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787×1092毫米1/32·5 9/16印張·107,000字

1961年6月第1版

1961年6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7) 0.50元

統一书号：10018·503 61.5·开型

自序

唐朝是我国古典詩歌的黄金时代，前于它的梁陈和后于它的宋明都不能同它相提并論，人們常常是把它和《詩經》、《楚辞》作为三足之鼎来看待的。唐詩是《詩經》和《楚辞》的进一步发展，它为我国文学史开辟了新局面。

唐朝共二百八十九年，从公元六一八年起，到公元九〇六年止。其間出現了难以数計的詩作者。士人、官吏、将士、釋道、妇女以及农民起义参加者都写下了可觀的詩篇。江湖、边塞、战場、閨閣、庙宇、官署、山林、旅途、客舍到处都有吟咏的声音。这些詩的体例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有乐府、歌行、古詩、律詩、絕句。有很多詩不仅广泛流傳于国内和各少数民族区域，連日本、朝鮮、越南都曾受其影响。

唐朝的詩人和詩篇大致有多少，是难以估計的。《新唐书：艺文志》別集类和总集类所录只是一些較著名的书。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录詩凡一千一百五十家，因系詩話性質，只录名篇。赵孟奎《分类唐歌詩》序言凡录一千三百五十三家，詩四万七百九十一首，可說是第一部較象样的唐詩总集。此书未見著录，收藏家也极少，到明朝时仅殘存二十七卷，清人吳騫只見過十册（見所著《拜經楼詩話》）。明人高棅所編《唐詩品汇》只有六百多家，詩五千七百多首。吳琯所編《唐詩紀》非全

唐詩，只收初、盛唐。胡震亨所編《唐音統籤》也沒有完全刊行。錢謙益有志于編輯全唐詩，用力不少。到清朝康熙時，《全唐詩》才以“御定”的名義完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以震亨書為稿本，而益以內府所藏全唐詩集，又旁采殘碑斷碣、稗史雜書之所載，補苴所遺……。”全書凡九百卷，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詩作者共二千二百餘人。但仍然並非真正的“全”唐詩，恐怕連一半也未到。如《新唐書·藝文志》載，劉希夷集十卷，令狐楚集一百三十卷，今存的詩都不過幾十首，即以胡震亨說的文筆四占其三、詩占其一說，也是散佚不少的。而在當時出于民間沒有成集的詩自然更多，胡氏沒有考慮及此，所以他說：“余以千卷籤唐音，在亡之詩，其猶幸相半也乎！”（《唐音癸籤》卷三十）

唐朝詩歌的發達不僅表現在詩人和詩篇的眾多，更重要的是這些詩人中有很多大家，象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陳子昂、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儲光羲、韋應物、李頎、劉長卿、劉禹錫、韓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孟郊、張籍、李賀、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等人，他們写下了很多卓越的甚至不朽的作品。別的詩人和無名氏也寫過一些優美可誦的名篇。真是姹紫嫣紅，百花爭艷。

《全唐詩》序說：“詩盈數萬，格調各殊，……精思獨悟，不屑為苟同。”這幾句話是說得不錯的。胡應麟說，其格有高卑、濃淡、淺深、巨細、精粗、巧拙、強弱之分；其調有飄逸、雄渾、深沉、博大、綺麗、幽閑、新奇、猥瑣之分（《詩薮》外編卷三）。那是決定于各個詩人的思想認識、他們對現實生活的態度以及文

学修养等等。由于他们“不屑为苟同”，“甚者宁为幽僻奇譎，杂出于变风变雅之外，而绝不致有蹈襲剽窃之弊”（《全唐诗》序）。当然，卑浅、猥琐和幽僻奇譎是不良的文风，然而这在《全唐诗》中所占比重是较小的。

唐诗为什么这样发达？由于隋末农民起义打击了隋朝封建势力，迫使继起的唐朝在某些方面对农民作了让步，生产关系上比起从前有了一些改变，生产力得以向前发展，经济日益繁荣。国家统一强盛。文化科学日进。这些都是唐诗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而经济的繁荣则是唐诗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除此以外，如唐朝诗人对于前代诗歌传统的继承、发扬和变革，加以唐王朝以诗赋取士，也有一定的影响。以后安史之乱以及延续不已的藩镇之乱，阶级矛盾激化，也可以认为是刺激唐诗创作发达的其它因素。那些认为诗只是抒写性情，而“性情所寄，千载同符”（同上）的看法，只是抹煞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继承和变革的关系，及所受各时代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罢了。

唐诗是我国重要的文学遗产，它曾经哺育过我国宋元以来一千多年的广大诗作者，更得到过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我们应该继承这份遗产，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尤其应该以唐诗中的优秀作品作为借鉴，把诗歌创作更为提高一步，使诗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得更好。我们今天的时代是极其伟大的，社会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广阔，决不是历史上的任何朝代所能比拟，我们必将有一个新诗歌的空前灿烂的黄金时代，事实上，大跃进以来的民歌民谣已经为这个时代揭开

了偉大的序幕。因此，批判地学习古典詩歌，从中吸取营养，促使更好地写出我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詩歌，在今天
是必要的。

回忆我的接触唐詩，是在童年时代，直到如今，三十多个
年头了，我仍然很喜爱它。我最初讀《唐詩三百首》，是有注和
旁訓的，不过我不爱看那些，只是讀正文。后来讀到王文濡的
《唐詩評注讀本》，才略为看看他的評注。以后讀《唐詩別裁》，
讀諸大家的专集，連仇兆鰲那样的注我也能看下去了。抗日
战争期中，我在中学里做国文教員，有几年几乎完全沉浸在唐
詩里面。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談唐詩的論文和詩人評傳之类我
也常看，有时心里不以为然，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来进行
研究。只有后来讀到聞一多先生《唐詩杂論》的时候，才曾經
动过一下念头，但当时生活很不安定，又没有心情来着手进
行。

唐詩对我精神上的慰藉和鼓舞很大，思想感情上也頗受
其感染。我早年很爱孟浩然的“韵高”，更爱岑参的“新奇”；李
长吉的“穠丽”和孟郊的“寒苦”也都引起过我的兴趣……。解
放后，当《光明日报》創刊了《文学遗产》时，我就想对唐詩加以
研究，借以弄清楚哪些詩对我的影响是好的，哪些是坏的，我
以为这样于我自己的文学認識和思想改造都会有一点好处，
且可供別人学习唐詩的参考。最先我写了《論孟浩然和他的
詩》、《略談岑参和他的詩》，前一篇肯定得过多了些，这次作了
补充和修改。其后續写了《論高适的詩》、《論初唐四杰及其
詩》、《論孟郊》、《論李商隱的政治詩》、《关于李商隱的爱情詩》

统一书号：10018·503

定价：0.50 元

目 次

自 序

論初唐四杰及其詩	1
論孟浩然和他的詩	29
略談岑參和他的詩	42
論高適的詩	58
論孟郊	76
論李商隱的政治詩	91
關於李商隱的愛情詩	118
附錄：論庾信及其詩賦	136

CAA/00/04

論初唐四杰及其詩

一

王勃、楊炯、盧照鄰和駱賓王四人，大都生于唐太宗貞觀年間，他們的文藝活動集中于高宗時代，所以被稱為“初唐四杰”。

四人的生卒年代有確切記載的只有王勃一人，據楊炯《王子安集序》：“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不改其樂，顏氏斯殂。”與王勃在其《春思賦》中所稱“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的年歲相符合。可見《舊唐書》本傳說他死于上元二年和《新唐書》本傳說他年二十九都是誤記，他應該生于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死于高宗上元三年（六七六年），年二十八歲。

楊炯卒年不可考，但《舊唐書》本傳載他于武后如意元年（六九二年）還向則天獻《孟蘭盆賦》，他的文集中有《后周明威將軍梁公神道碑》，提及梁死于長壽二年（六九三年）二月，其時楊炯還活着，在四杰中恐他死得最晚。又他的文集中有一篇《從弟去盈墓志銘》，記他的弟弟“春秋二十有六，以上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歿于京師”（《盈川集》卷九），可見他的生年當比他的生在公元六五一年的弟弟稍前，和王勃的生年相近。

卢照邻的生卒年代最多异說，有說是六三七年——六九〇年的，有說是六五〇年——六八九年的，不可不略加考証。

按《旧唐书》本傳記叙卢照邻的一生道：

（卢）年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学善屬文，初授邓王府典签，……后拜新都尉，因染风疾去官，处太白山中，以服餌为事，后疾轉篤，徙居阳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誦，……自投潁水而死，时年四十。

曹宪是隋朝的秘书学士，又是当时著名的文字学大师，《旧唐书：儒学列傳》載貞观中太宗征宪为弘文館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太宗讀書遇有难字即录以問宪。据此，卢照邻向他学蒼雅也應該是去到揚州他的家乡的（卢的《釋疾文》說“訪旧篆于南越”，当即与此行有关）。王义方則史載他博通五經，高宗显庆末罢官后讲学于昌乐（《旧唐书：忠义列傳》），但我认为那时卢照邻已經不止十余岁而是二十余岁（說詳下），故我以为他的向王学习，是早年在揚州学完蒼雅后北返，到泗州漣水王义方的家乡或洹水王义方的任所去学的（《釋疾文》所謂“得遺书于东魯”，或即与此行有关）。

至于卢照邻的做邓王府典签，應該在此稍后，《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列傳》系于貞观二十三年以前，《新唐书：高祖諸子列傳》則不記年，惟張鷟《朝野僉載》卷六記卢初仕的年岁較明白，他說：

（卢）弱冠，拜邓王府典签。

按卢照邻在六七三年做的《病梨树賦》，序文称“余年垂强仕”（《礼記》：“四十强而仕”），則其弱冠之年当为高宗永徽五年

(六五四年)左右，張鷟又說：

(邓)王有书十二車，照邻总披覽，略能记忆。

足見卢照邻做典签还不止一二年。卢的《五悲文》說：

自言少年游宦，来从北燕，淮南芳桂之岭，峴北明珠之川。

邓王曾兼邓、梁、黄、寿、襄五州刺史，与所述区域也相符合。

稍后，是他拜新都尉的时间，可以从他的詩文中約略看出。《四庫全书总目提要》說：

集中《相里夫人櫛龕序》称乾封紀岁，当为乾封元年丙寅，《对蜀父老問》称龙集荒落，当为总章二年己巳，皆在益州时所作，《病梨树賦》称癸酉之岁臥病长安，則其罢官当在咸亨四年以前，計其栖迟一尉，仅五六年。(卷一百四十九)

从乾封元年(六六六年)到咸亨二年(六七一年，按卢在《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文中称：“法师又于咸亨二年正月十八日寢疾之际……”)，这段时间可以确定卢照邻是在西蜀的，但是說他栖迟一尉仅五六年則未必然。据《早度分水岭》一詩“丁年游蜀道，斑鬢向长安”看，他應該在高宗显庆年間就去到西蜀了。《全唐詩》称丁年一作千年，斑鬢一作万里，“千年游蜀道”是不可解的，除非是“十年游蜀道”之誤，但不管怎样，卢照邻在西蜀是不止住过五六年的。

需要附带說明，聞一多在《四杰》一文(《聞一多全集》第三冊)中引据《唐会要》卷八二所載显庆三年(聞氏誤为二年)卢照邻与宋令文、孟詵等向太白山人孙思邈执师贊之礼一事(《譚宾录》同，見《太平广記》卷二百十八)，是显然錯誤的。《旧唐书；方伎列傳》这样記載：

太宗即位，召(孙思邈)詣京师，……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辞疾請归，特賜良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卢照邻等执师贊之礼以事焉。

《新唐书：隐逸列傳》所載除显庆四年作显庆中以外(可能三年召征，四年召見)，其余完全相同，《大唐新語》卷十只記卢向孙学习为高宗时事，沒有記年，新旧唐书的这个記載是比較确切可靠的。上元元年(六七四年)岁次为甲戌，与《病梨树賦》所称癸酉岁相接，或者卢照邻第一年和孙思邈見面，第二年因治病向孙执弟子礼，学老庄及医学，頗有可能(《仙傳拾遺》即系此事于上元元年，見《太平广記》卷二十一)。只是孙的寓居鄱阳公主邑司是在咸亨四年而不是在上元元年(卢照邻《病梨树賦》序里說：“癸酉之岁，余臥病长安光德坊之官舍，……时有处士孙思邈居之。”《譚宾录》系于显庆三年下，尤为疏漏)，新旧书等所記自不如卢照邻所記为可靠。

《唐会要》所称显庆三年卢向孙学习，我以为有不合者二：(一)卢照邻《釋疾文》自叙說：“先朝好吏，予方学于孔墨；今上好法，予晚受乎老庄”，显庆三年(六五八年)卢仅二十余岁，怎么能說“晚受乎老庄”呢？(二)如果承认卢向孙学习是在他离蜀以后(参看《病梨树賦》序、《大唐新語》卷十和孙思邈傳便知)，則显庆三年王勃仅十岁，而卢照邻前此在蜀中与王勃游玄武山賦詩时，楊炯《王子安集序》記于十四岁以后，王勃《入蜀紀行詩序》并明說：“总章二年(六六九年)五月癸卯，余自常(长)安观景物于蜀，……迨弥月而臻焉。”《游山庙序》說：“吾

之有生二十載矣，……粵以胜友良暇，相与游于玄武西山庙，盖蜀郡三灵峰也。”这年代就是显然不相合的。

《朝野僉載》还說：“（照邻）为益州新都尉，秩滿，婆娑蜀中，放曠詩酒。”（卷六）說明卢照邻还不是一罢官就离开西蜀的。总計他在蜀应有十几年之久。从他的《还赴蜀中贻示京邑游好》看，他中間还回到过长安一次。《对蜀父老問》說：

大唐之有天下也，出入三代，五十余載（自六一八年——六六九年），月竊來庭，风丘款塞，……若余者十五而志于学，四十而无聞焉。

自然，“四十而无聞”是《論語》里的一句陈言，不能說写这样的文章时卢照邻正好是四十岁，但我以为总得在三十五岁以上才好这样說的（正如“十五而志于学”也是用《論語》里的話，但他志学总应在十岁以后）。还可証以上面提到的他在六七三年所作《病梨树賦》序文說的：“余年垂强仕，則有幽忧之疾。”如定六六九年为三十五岁，則六七三年恰为三十九岁，与“年垂强仕”也相合。由此我推定卢照邻当生于六三五年。如有人說的六三七年生，則六七三年他三十七岁，还可說是“年垂强仕”，六六九年却只有三十三岁，怎么好說“四十而无聞”呢？

卢照邻的死更是一个問題，《旧唐书》本傳說他死时年四十，显然是不妥当的，我們既已指明他在六六九年已經三十五岁，而他在《寄裴舍人諸公遺衣藥直书》里說：“余家咸亨中良賤百口，自丁家难，私門弟妹凋喪，七八年間貨用都尽。”如自咸亨元年（六七〇年）起算，則八年后为仪凤三年（六七八年），卢照邻尚在人間。《釋疾文》序又說：“余羸疾不起，行已十年。”

說明此文之作为更后。文中还說：“今上好法，予晚受乎老庄。”这所謂“今上”，即令不是《新唐书》本傳所认为的是武后，也应该是中宗或睿宗，六八四年中宗在位仅一月，是談不上好法不好法的，最少睿宗文明元年（六八四年）卢照邻还一息尚存，吟吐着他的絕命之辞，那时他已是五十以上的人了。

駱賓王的生卒年代也是沒有記載的，甚至連他是否被杀都有不同的說法，《旧唐书》本傳說他参与了徐敬业反对武則天的斗爭，“兵敗被誅”，《新唐书：李勣傳》附《徐敬业傳》載敬业与宾王等失敗后逃至海边，被徐的部将王那相所斬凡二十五首，应包括宾王在內，《駱宾王傳》却又說他是“不知所之”。此外甚至还有“与敬业兴兵揚州，大敗，投江而死”（《朝野僉載》卷一）为应其《帝京篇》：“須臾失浪委泥沙”之讖的說法，以及后来宋之間和他見面續詩而宋不相識，敬业和宾王都逃亡为僧病死等等的傳說（孟槩《本事詩》）；但为僧之說是不可靠的，宋之間和駱宾王是相好的朋友，絕不会見面而不認識，如果他和徐敬业未死，則天未必不加搜捕，她曾怒斲敬业祖父徐勣的棺木，且罗織甚广，可以看出她对那些“叛逆”者的态度。因此，說宾王兵敗被杀或敗后投江而死是比較可信的。

《唐語林》卷二还有如下的記載：

駱宾王年方弱冠，时徐敬业据揚州而反，宾王陷于賊庭，其时书檄，皆宾王之詞也。

如果真的在光宅元年（六八四年）徐敬业起事时駱宾王才二十岁，則他比王勃、楊炯的出生为晚了。这不仅和新旧唐书本傳所述曾做道王府属、武功主簿，数上书言事，除临海丞，又弃官

去到揚州的駱賓王应有的年歲不相合；就從駱賓王的文集中也可以看出，他在世的年歲是比較大的，如《與親情書》說：“某初至鄉關，言尋舊友，耆年者化為異物，少壯者成為老翁，……詢問子侄，彼亦凋零。”（卷七）《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啟》說：“某散材易朽，……老不曉事，有類揚雄。”（卷六）古人不到接近五十歲，習慣上是不說老的，而這兩篇東西又顯然是在光宅元年徐敬業敗死以前寫的，所以《唐語林》的記載無疑是錯誤的，駱賓王的生年我推定最少應在此四十六、七年前，即公元六三八年左右。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盧照鄰年齡最長，其次是駱賓王，兩人都比王、楊大十多歲。聞一多除了根據這點（他認為盧駱平均比王楊大十歲左右），還指出王楊和盧駱的性格、友情、作風上的某些不同，認為他們應該屬於兩個集團。他說：“四杰這徽號，如果不是專為評文而設的，至少它的主要意義是指他們的賦和四六文。”又說：“在那時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詩的正宗。……按時人安排的順序，王楊的名字列在盧駱之上，也正因他們的貢獻在五律。”（《四杰》，載《聞一多全集》第三冊，二三、二九頁。）這些說法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可是不管當初評文的人是怎樣想法，事實上“四杰”的稱號能在文學史上成立，並為廣大讀者所同意，我以為首先是因為他們在唐代文學特別是唐詩發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他們共同反對了上官儀之流的文風，在客觀上和上官體形成了對立的局面，表現了改進齊梁詩的新的傾向。

楊炯稱贊王勃說：

龙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竟為雕刻，襍之金玉龙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

（勃）思革其弊，用光志業。

所謂龍朔初年（六六一年左右）的“文場變體”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呢？《舊唐書：上官儀傳》說：

上官儀，本陝州陝人也。……舉進士，太宗聞其名，召授弘文館學士，累遷秘書郎，時太宗雅好屬文，每遣儀視草，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嘗預焉。高宗嗣位，遷秘書少監，龍朔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西台侍郎同東西台三品，兼弘文館學士如故。本以詞采自達，工于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頗有學其體者，時人謂之上官體。

這“綺錯婉媚”的評語是下得很恰當的，和楊炯說的“爭構纖微，竟為雕刻”是一致的。這是由於隋末農民起義的風暴已成過去，封建統治階級又開始以單純追求技巧的內容貧乏的作品來點綴他們安富尊榮的剝削生活，粉飾不合理的社會現實。《詩苑類格》載他所說“詩有六對”：

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

又有八對之說，分析詩的對偶也是極為細密的。上官儀的這些研究對於律詩的創作不是沒有一點用處，但是他把詩的創作局限在這些上面，就是異常錯誤的了。《全唐詩》卷二所收上官儀的詩共二十首，那些應制詩實不足取，如《早春桂林殿應詔》：

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曉樹流鶯滿，春堤芳草積。風光翻